

【历史】·宋史研究专题·

从官方到民间：
仓储建置与宋代救荒的社会力量

何 适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 上海 200234)

摘 要:义仓、常平仓、社仓是宋代最重要的三种仓储机构,三者互有差异,同时保有共性。在差异与共性当中,官方与民间两种力量贯穿其中,并产生重要的影响。从官方与民间参与仓储机构的不同方面及程度,可以考察宋代救荒主体力量的分布及其转移。义仓体现出宋廷对民间力量的重视,常平仓象征着官方力量的主导性,社仓的出现则标志着民间力量主体性的凸显以及宋代救荒力量从官方向民间的转移。

关键词:宋代;仓储;社会救荒;官方;民间

中图分类号:K 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87(2015)03-0100-08

DOI:10.13763/j.cnki.jhebnu.psse.2015.03.018

引言

中国古代仓储机构,种类繁多。它们的功能往往各有侧重,但若从整体上观察,这些仓储又不乏一致性,即都是古代社会救荒体系中的重要一员。作为备先之具,它们为社会赈济提供基础而重要的物资保障,成为时人实践救荒思想的载体。宋代是古代仓储机构发展的重要阶段,古代社会中与荒政相关而最为重要的三种仓储机构——义仓、常平仓、社仓——在此间都受到重视,并曾同时并存。这一点凸显了两宋时期在古代仓储机构发展史上的特殊地位,也指示着仓储机构在宋代赈济体系中的重要性。以往对宋代仓储机构的研究,多是从制度层面展开,探讨某一具体仓储的建置沿革、管理机制、功能流弊等问题^①;缺少综合型的比较研究,进而忽视了不同社会成分参与各种仓储的程度。而通过比较研究之后的总体观察,可以发现两宋时期救荒力量的分布,而随着历史的演进,这种分布有一个从官方到民间的转移趋势。所以本文试图首先对上述宋代三种仓储机构,从多个方面做比较研究,尤其注意官方与民间参与其中的不同程度,进而探究两宋时期救荒力

量的分布与转移。

一、宋代三种主要仓储机构的建置

宋代义仓、常平仓、社仓的兴置时间有先后之别,具体背景也不尽相同。义仓之设,始于宋太祖。建隆四年(963年)的诏令^②有言

多事之后,义仓废寝,岁或小歉,失于预备。亦令诸州于所属县各置义仓,自令官中所收两税,每顷别输一斗贮之,以备凶歉,给与民人。^[1](P7123)]

其时,五代以来之地方势力尚未全部平定,而太祖已留意于荒政;所以宋代仓储机构的兴置,早在有宋建国之初就开始了。其目的是谋求一定的物资储备,以备不时之需。宋代义仓设于州、县城郭,民众于缴纳两税之际,以十分之一的比例别输义仓,是为义仓之仓本来来源。义仓由官方管理,当“凶歉”之际,再无偿“给与民人”,缓解时困;这涉及义仓所储之物的使用方式。诏文所谓凶歉,主要指的是水旱之灾,这一点与隋唐时代义仓的主要功能是一致的^[2]。宋代义仓的收纳与使用规则,此后虽有调整,但大体即定型于此。

收稿日期:2015-02-10

作者简介:何适(1987-),男,湖北广水人,在读博士,主要从事宋史、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研究。

不过宋代义仓早期的建置并不稳定,不但太祖朝的义仓未久即遭废罢^⑤,仁宗、神宗两朝,关于义仓的争论也先后反复、兴废不定,义仓未能长久存在。但仁宗、神宗两朝在宋代义仓的建置沿革中却有着特殊的意义:仁朝义仓虽未久而罢,但宋代义仓中央、地方,两级三层的管理模式却正是形成于此间^[3];而神宗时期的元丰义仓法又多为以后宋人所称赞,相当程度上被视为“祖宗之法”,成为了校正义仓流弊、规范义仓运行的重要言论依据。然而,元祐初年,旧党登台,几乎尽革新法举措,义仓也随之废罢。此举自然引起反对,待宣仁太后一死,随之便有“绍述”之举。哲宗朝义仓的复置,相当程度上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史载:

绍圣元年(1094年)闰四月十六日,侍御史虞荣请复置义仓。三省言:“旧行义仓法,上户苗税率一顷出米五升。”诏除广南东、西路外,并复置义仓,自来岁始。放税二分以上,免输。所贮义仓,专充赈济。辄移用者,论如法。^{[1](P7216)}

宋代义仓建置的稳定,即是绍圣元年以后的事。自此以后,宋代义仓的设置才成为常态。而与此相随,此前宋人关于义仓兴置、废罢的争论,遂转移到义仓制度的建设与调整上来。所以绍圣元年复置义仓,在宋代义仓建置沿革的历史中,实具有标志性的意义。

宋代首置常平仓在太宗朝,稍晚于义仓。其时京畿丰收,物价偏低。宋廷遂增价收购物资,设常平仓以储之,以为将来经济调控中减价出粜之资本。《宋会要辑稿》记太宗淳化三年(992年)六月诏曰:

京畿大穰,物价至贱,分遣使于京城四门置场,增价以籴。令有司虚近仓贮之,命曰‘常平’,以常参官领之。岁歉,减价以粜,用赈贫民,以为永制。^{[1](P7197)}

按诸诏文,淳化年间常平仓的设置只限于京城一隅,其主要功能乃平抑物价。所以常平仓钱物的使用方式,乃是用以进行“增价以籴”、“减价以粜”之类的物资交易。宋廷在更广的范围内兴置常平仓,是从真宗景德年间开始的。《续资治通鉴长编》记真宗景德三年正月辛未:

始置常平仓也。先是,言事者以为水旱灾沴,有备无患,古有常平仓,今可复置。请于京东西、河东、陕西、江淮、两浙计户口多少,量留上供钱,自千贯至二万贯,令转运使每州择清干官主之,专委司农寺总领,三司无得辄用。每岁夏秋,准市估加钱收籴,贵则减价出粜。于是,

司农官吏创廩舍,藏籍帐,度支别置常平仓案。^{[4](P1385)}

此处所谓“始置”,乃是针对京城以外的地方政区而言,由引文可知其设置地域是很广泛的。其中仓储之设置地虽未明言,其实也是集中在州、县城郭;与义仓设置地相同。除此之外,常平仓的制度设定诸方面也有清楚地规定:常平仓仓本来源主要是地方“上供钱”;仓体管理也是中央(由“司农寺总领”可见)、地方联合管理的模式。真宗朝接下来还有不少完善常平仓制度的举措^{[1](P7197~7199)},主要涉及一些细节问题,宋代常平仓的一些主体原则大体定型于此。但这里有两点需要注意:(一)引文中言事者以“水旱灾沴,有备无患”为由,请“复置”常平仓。表面上看,这似乎表明常平仓的功用与义仓一致,实则不尽然。常平仓实际上仍然是以“加钱收籴”、“减价出粜”的原则运行的。只不过这一举措经常出现在灾害发生之时。(二)真宗朝以后,常平仓的建置,整体上一一直相对稳定。惟熙宁新法时期,青苗法的推行,使得常平仓设置之初的基本用意多有变异,其平抑物价的主要功能一度转变为青苗放贷^[5]。但严格来说,这一转变只是仓本使用方式或仓储运作程序的变化,若从仓储机构这一实体着眼,则常平仓的存在,仍是稳定的。宋室南渡以后,这一特点保持不变。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宋代义仓早期建置的那种兴废反复的波动现象,在宋代常平仓的建置沿革中是看不到的。这关系到两仓之异同问题,下文会有专门比较,此处暂不详及。

社仓是讨论的宋代三种仓储中兴置时间最晚的一种。史载宋代“诸乡社仓自拨之始”,拨之即魏拔之,字子实,初字元履。《宋史》本传记其“师胡宪,与朱熹游”,曾“依古社仓法,请官米以贷民,至冬取之以纳于仓。部使者素敬拔之,捐米千余斛假之,岁岁敛散如常,民赖以济。”^{[6](P13468~13469)}考之朱熹《建宁府建阳县滩社仓记》及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魏氏设置社仓之事发生在高宗绍兴二十年^④。今人的代表性研究也从此说^{[7](P427~473)}。其实关于社仓的言论早在北宋神宗时期即已出现,当时见于义仓运行过程中的流弊,钱颉在《上神宗乞天下置社仓》^[8]一文中已有兴置社仓的建议,只是当时并未付诸实践而已。而且魏氏之举,实乃地方官吏在局部地区的特殊惠政,当时并没有在大范围内产生实际的影响。宋代社仓的进一步推广,得益于后来朱熹等人的努力。朱熹文集中有《建宁府崇安县五夫社仓记》一文,对宋代社仓的兴置等问题有清楚地交

代。朱子的原文较长,下面所截引者,是为兴置社仓的重要背景。朱熹云:

予惟成周之制,县都皆有委积,以待凶荒。而隋唐所谓社仓者亦近古之良法也。今皆废矣,独常平义仓,尚有古法之遗意,然皆藏于州县,所思不过市井惰游辈,至于深山长谷,力穡远输之民,则虽饥饿濒死,而不能及也。又其为法太密,使吏之避事畏法者,视民之殍而不肯发,往往全其封鏹,递相付授,至或累数十年不一瞥省。一旦甚不获已,然后发之,则已化为浮埃聚壤,而不可食矣。夫以国家爱民之深,其虑岂不及此?然而未之有改者,岂不以里社不能皆有可任之人,欲一听其所为,则惧其计私以害公,欲谨其出入,同于官府,则钩校靡密,上下相通,其害又必有甚于前所云者,是以难之而有弗暇耳。^{[9](P3721~3722)}

朱熹首先肯定了义仓、常平仓尚有古法——县都皆有委积,以待凶荒——之遗意,可见他并未完全否定义仓、常平仓存在的基本用意。但他的主要目的恐怕是要强调两仓仓储“皆藏于州县”,以至于“深山长谷,力穡远输之民”多得得不到及时救济的现实,从而揭示常平仓与义仓在赈济过程中的局限性;这与上文提及的神宗时期钱顗关于兴置社仓的背景是类同的。此外,法令限定严格,吏员因“避事畏法”,往往不能及时发放米粟赈济,“至或累数十年不一瞥省。一旦甚不获已,然后发之,则已化为浮埃聚壤,而不可食矣。”这也是朱熹的时代仓储流弊的一种重要表现。朱熹之所以在当时对已存各仓的利弊做出分析,除了常平仓和义仓长期以来存在制度上的流弊之外,其实也是为身边的现实环境所激,此现实环境即《社仓记》开头所谓“乾道戊子(1168年),春夏之交,建人大饥”也。这是最为直接的现实因素。

朱熹在野时能实际推行社仓,其在朝时也积极建言推广社仓。淳熙八年(1181年)他得面奏孝宗于延和殿之机会,即向孝宗“极陈灾异之由与夫修德任人之说”,可见他对救济灾异此类社会事业的重视。孝宗亦是“动容竦听”^{[10](P122)},不久即“下朱熹社仓法于诸路”^{[6](P677)}。宋代社仓的兴置,由此得以在南宋全域展开。两宋时期最为重要的三类与救济相关的仓储机构,自此在宋代长期并存。朱熹奏割的原文较长,但多关乎宋代社仓仓本来源、管理等相关问题,故详录其文如下:

臣所居建宁府崇安县开耀乡有社仓一所,系昨乾道四年乡民艰食,本府给到常平米六百

石,委臣与本乡土居朝奉郎刘如愚同共赈贷。至冬收到元米,次年夏间,本府复令依旧贷与人户,冬间纳还。臣等申府措置,每石量收息米二斗,自后逐年依此敛散。或遇小歉,即蠲其息之半,大饥即尽蠲之,至今十有四年,其支息米造成仓数三间收贮,已将元米六百石纳还本府,其见管三千一百石,并是累年人户纳到息米,已申本府照会,将来依前敛散,更不收息,每石只收耗米三升。系臣与本乡土居官及士人数人同共掌管,遇敛散时,即申府差县官一员监视出纳。以此之故,一乡四五十里之间,虽遇凶年,人不阙食。窃谓其法可以推广,行之他处,而法令无文,人情难强。妄意欲乞圣慈特依义役体例,行下诸路州军,晓谕人户,有愿依此置立社仓者,州县量支常平米斛,责与本乡出等人户主执敛散,每石收息二斗,仍差本乡土居或寄居官员士人有行义者,与本县官同共出纳。收到息米十倍本米之数,即送元米还官,却将息米敛散,每石只收耗米三升。其有富家情愿出米作本者亦从其便,息米及数,亦当拨还。如有乡土风俗不同者,更许随宜立约,申官遵守,实为久远之利。其不愿置立去处,官司不得抑勒,则亦不至骚扰。^{[9](P649~650)}

据此可知,宋代社仓得以兴置的基础本钱,乃支借于常平仓,待运行之后,积累有数,则归还支借数目;之后社仓运行中敛散的收息即是其持久的仓本来源。社仓设置地在乡社,而非州、县城郭;朱熹有鉴于前,此是事所毕至。但由此也影响到社仓管理制度的设定,由于更近基层,所以社仓管理多委“本乡土居或寄居官员士人有行义者,与本县官同共”负责。此外,据朱熹的说法,“乡土风俗不同者”,也有其“随宜立约”的可能。如社仓的仓本来源也可能是由民间提供,如朱熹《建昌军南城县吴氏社仓记》一文就记录了绍熙五年吴氏兄弟“发其私谷四千斛”^{[9](P3814~3816)}以立社仓的事。而不愿置立社仓的乡社,官司亦不得抑勒。这些现象表明,宋代社仓的兴置,较义仓、常平仓而言,更具灵活性。

以上是对宋代义仓、常平仓、社仓诸方面的梳理,宋代其他仓储如司农仓、广惠仓、惠民仓、举子仓等则并未在文中一一呈现。事实上,宋代仓储种类繁多,若逐次考述,绝非本文所能容纳得了;加上诸仓从存续时间及推行区域方面看,往往并不具有相当的代表性,泛泛的比较,并无意义可言,也与本文主旨不合。故而宋代其他仓储机构,一概从略。接

下来将据以上考述,对宋代三仓作一综合比较。

二、共性与差异:宋代仓储机构的比较分析

通过以上对宋代义仓、常平仓、社仓诸方面的考述,可以看到三仓的建置背景各有不同。这一重要因素,使得三仓在功能定位或制度设定方面,多表现出各自的特色。对此加以区分比较,不但对于认识宋代仓储机构的性质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也可以从中看到宋代救荒力量的分布及其转移动向。为了

使接下来的比较不至于毫无标准,在正式比较之前,有必要先对将要比较的方面略作界定。整体来说,此类比较将直接围绕与仓储机构运作相关的诸方面而展开,如三种仓储的首置时间、设置背景、存续时间、仓本来源、设置地点、管理模式、钱物使用等都会有所涉及。但这种比较并不追求巨细无遗的面面俱到,只就主要方面,集中阐述。为方便比较,兹先据上文的考述,制成“宋代义仓、常平仓、社仓比较简表”(表1)如下,以为比较、综述之资。

表 1

	义仓	常平仓	社仓
首置时间	太祖建隆四年(963 年)	太宗淳化三年(992 年)	孝宗乾道四年(1168 年)
设置背景	乱后灾荒无备	京畿物价失衡	见存仓储流弊多端
存续时间	约 230 年	约 280 年	约 100 年
仓本来源	民众自出	政府提供	政府或民间
设置地点	路、州、县	路、州、县	乡社
管理模式	中央、地方两级三层	中央、地方两级三层	民间自理
钱物使用	无偿俵散	市场交易	借贷(低息)
主要功能	赈济灾荒	平抑物价	赈济灾荒

从首置与存续时间方面看,宋代义仓的首置时间最早。但宋代义仓早期的建置并不稳定,所以义仓的兴置时间虽比之常平仓早近三十年,其整体存在时间却少出五十年。宋代社仓的首置时间最晚,存续时间也最短。但在北宋时期已有兴置社仓的言说,这一点也需要特别注意。首置与存续虽是时间问题,实际上则联系着官方与民间参与其中的不同程度,关涉宋代救荒力量的分布问题。关于这一点,下文有进一步论述,此处暂不详及。

从设置背景上看,宋代义仓的兴置,是唐末五代战乱大体结束之后,面对社会救荒机制不完善的现实,宋廷推出的一项针对水旱灾荒的社会救济政策。常平仓设置时,面对的主要问题却是市场物价失衡。物价失衡虽然往往与灾害相关联,但不限于灾害之时。至于社仓之置,则是基于当时见存仓储流弊多端,不足以起到良好赈济作用的社会现实。但在功能方面,社仓更多地是与义仓类同。由于三种仓储机构之建置存在以上的背景差异,从而导致它们在功能定位与制度设定方面多有不同。

从功能方面看,宋代义仓的功能多样,但主要在于赈济水旱之灾。常平仓的设置也与赈济相关,在水旱之时虽也可以出糴米粟,但此举不但限于水旱灾害发生之际,而且其直接而主要的用意,在于平

抑物价,乃是官方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其在客观效果上对救荒有一定的缓解作用,并不表示它与救荒的联系比之义仓更为紧密。社仓的出现,不是为了在常平仓、义仓之外再开出一主题功能,而是为了尽可能消除义仓(也部分括常平仓)的流弊。从这个意义上讲,宋代社仓与义仓在功能上是完全相同的;社仓可以看做是义仓的延续^⑤。与仓储的功能相关,制度规定的各仓仓储的使用方式也不尽相同:常平所储主要是通过抛售与购买等市场交易来发挥作用,义仓所储则是无偿俵散,社仓则是以低息借贷的方式。这一差别从根本上来说,是由各自仓本来源的不同决定的。

从仓本来源上看,常平仓仓本为截留的上供钱,由政府直接提供;义仓仓本随两税附缴,由民众直接缴纳。后者收纳仓本,必须照顾到民间社会的一般反应;民间对义仓态度之好坏,对于义仓的存废也有着重要影响。宋代义仓早期兴置的波动与此不无关联,上一节注释中所引太祖废罢义仓之诏即是明证。而常平仓唯有官方参与其中,仓本来源相对于义仓更有保障。故而类似义仓在收受环节中出现的诸种流弊(如地方胥吏之增加收纳比例),在其运行过程中也更为少见。这是其建置比义仓稳定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太宗兴置常平仓之后,不见如同义

仓那样兴废反复的情况,是很能说明问题的。与以上两仓比较,社仓的仓本来源则表现出多元化的特点,民间与官方均可能参与其中。所可注意者,虽然官方在社仓兴置之初可能参与其中,但在仓储之后的运行过程中,却逐渐退出其中,社仓基本成为一个自足的运行系统。所以整体来说,社仓是一个以民间力量为主体的仓储机构。

从设置地与管理机构方面看,宋代常平仓、义仓二者存在共同的特点。表现为两仓在路、州、县均有设置;具体管理也有几近一致的模式(参见表2)。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隶属同一机构(中央,中枢理财机构;地方,提举常平司),官方在其中占有绝对的主导地位。从这些相同点来看,常平仓与义仓的关联也是相当密切的,以至于义仓的运行程序以及功能多有受到常平仓的影响^[3]。透过这一点,也可以看到官方相对于民间的一种强势。不过宋代义仓与常平仓之设置是出于不同的具体需求,两仓虽有相同之处,终究不能掩盖其互异点。至于宋代社仓,由于其设置地更为基层,且参与成分多元化,所以在管理方面也与上述另外两仓不同。其一个主要的特点是,民间力量在其中占有重要的分量。官方出资兴置的社仓可以委“有行义者”如“本乡土居”打理,由民间出资的社仓则更是如此。

以上从多个方面,对宋代主要的三种仓储机构之共性与差异做了比较分析。作为宋代最具代表性的三种全域性仓储^⑥,尽管它们存在多方面的差异,但作为重要的备先之具,它们在社会救济过程中,都曾起到重要的作用,这是三仓最为重要的一个共性。但这里有两点需要特别注意:(一)宋人关于救荒的即时言说以及灾荒之后的事后总结,每每以义仓说事,所以综合功能设定、存续时间等多方面的因素,宋代义仓可以说是宋人实践救荒思想最为典型的仓储机构。关于这一点,董炯的《救荒活民书》^[11]为我们提供了绝佳的证据^⑦。(二)官方与民间这一对力量,在上述仓储机构各个方面几乎都发生了重要的影响。宋代仓储机构在兴置与管理,功能设定与运作机制等方面,都涉及官方或民间因素;其之所以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官方与民间参与其中的不同程度而决定的。以往对宋代仓储机构的研究,多注重制度设定方面,对这一主题缺少足够的重视,更没有比较之后的综合性论述,故而无法从整体上把握宋代救荒力量的特性。兹就上文所论述,对这一问题作进一步的考察。

三、官方与民间:宋代救荒的社会力量

近人邓拓在研究古代救荒史时指出,古代的救荒思想大致可分为“消极救济”与“积极预防”两个不同的类别,各类之具体举措也多种多样^[12]。且不论邓氏的划分合理与否,无论是消极论还是积极论,若无事先的物资储备,大部分举措显然是无法展开的。作为备先之具的仓储机构,由于官方与民间在其中的参与程度不同,一方面对仓储本身的运行有着重要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反映着两类社会力量在社会救荒中的作用程度。就宋代而言,这一问题关涉到两宋时期救荒力量的整体分布及其动态,甚至明清时期社会救荒机制的演变,在一定程度上,与宋代有着很大程度的相似性^[13]。其重要性可见一斑,不应置之不论。

上述三种仓储机构中,义仓与常平仓的建置,都由宋廷主动为之,官方因素在其中占有绝对的主导地位。关于这一点,上面的论述已有所涉及,但仍有几个问题需要作进一步的阐述。首先是仓本来源与管理制度的问题。仓本是仓储机构得以存在并发挥作用的基础,宋代常平仓仓本以各地截留之上供钱充,是三种仓储中仓本最为稳定者。仓本的稳定,使得仓储建置的稳定性增强,其在社会救济中发挥的作用自然更为持久。另一方面,由于仓储由官方主导,所以对其职能的变更也体现出官方的权威性所在。最为典型的例子是神宗变法时期常平仓被用以推行青苗法^[1](P6041~6043)]。从仓储机构的角度来说,这自然是制度的变异,但此处恰恰最能体现官方意志的存在。

与常平仓类似,宋代义仓也是官方主导的一类仓储机构。义仓在两宋时期兴废反复,最终都以官方的诏令为依据,地方官吏尚无自主兴置义仓之权力,民间力量在宋代义仓建置与运行过程中更没有存在的空间。今人认为“地方官自动设置义仓”构成宋代义仓特点之一^[14],实际上即使从哲宗绍圣年间复置义仓算起,义仓于宋代存在时间就已近两百年之久,而据笔者翻检及,此间几无关于官吏私置义仓之记载,所以地方官私立义仓为宋代义仓一特点的论断,恐怕很难成立。义仓仓本则与官方两税收纳直接挂钩,按一定之比例随两税一并上缴。除仓本来源外,义仓与常平仓的管理也由官方全面负责,以下是“两宋时期义仓的管理机构简表”(表2),表中加粗字为中枢理财机构;熙宁至元丰及元祐年间义仓见废,所示为延续义仓管理机构;州县为负责人,机构乏考^[3]。

表 2

时期 <	
---	--

间早,且官方介入的力度最大。由此可见宋代官方在社会救荒中的主导作用。藉与救荒紧密相关的仓储机构为观察视角,可以说官方力量贯穿宋代社会救荒的始终。但宋代救荒力量并非全部由官方承担,官方也积极引导民间力量参与其中,宋代义仓的兴置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义仓仓本出自民间,管理却由官方负责,恰好体现了官方在统筹民间力量上的努力。所可注意者,义仓是本文讨论的三种仓储机构中兴置最早的一种,且功能直接与社会救荒挂钩,这一特点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出宋廷关于社会救荒的主要思考,即官方主导,民间参与。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动,民间力量在社会救荒中的主体性有相当的提升,南宋时期社仓的兴置与推广,可以说具有标志性的意义。社仓在功能设定上延续义仓,仓本与管理却相当程度上是民间力量参与其中。这一点与常平仓、义仓中官方的高度介入形成了明显的对比。民间力量在社会救荒中地位的加重,说明南宋孝宗时期对救荒过程中的社会力量有一次明显的调整,更加看重民间力量的作用。这一变动反映着宋代救荒力量整体分布的变动,经过两百多年的历史变迁,宋代救荒对民间力量的依赖程度大幅增强。

注 释:

- ① 清人俞森在《荒政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7年,第663册)中,分三卷对义仓、社仓、常平仓依次考述,虽为通论,但可视对宋代仓储的最早研究。今人关于宋代仓储的专题研究,详略不一,比较重要有蔡华:《北宋义仓制度述论》,《甘肃理论学刊》1993年第5期;许秀文、阎荣素:《论宋代义仓》,《河北学刊》2006年第5期;郭九灵:《宋代义仓论略》,《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2008年第3期;孔祥军:《两宋义仓研究》,《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10年第4期。笔者的硕士学位论文《宋代义仓研究》(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2013年),在前人的基础上,对宋代义仓有更全面与系统的分析。关于宋代常平仓的研究,有马玉臣、郭九灵:《论王安石对宋代常平仓的改革及影响》,《烟台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王文东:《宋朝青苗法与唐宋常平仓制度比较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3期;贾玉英:《宋代提举常平司制度初探》,《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3期;宋炯:《宋代提举常平司的沿革与财政体系的变化》,《安徽史学》2002年第1期;孔祥军:《两宋常平仓研究》,《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9年第4期。有关于宋代社仓,最典型的研究就是台湾梁庚尧的《南宋的社仓》,见《宋代社会经济史论集》,台湾: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第427—473页。除以上单篇论文以外,尚有专著涉及宋代仓储,最早的为民国时期于佑虞的《中国仓储制度考》(南京:正中书局,1948年版)。今人张文的《宋代社会救济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及李华瑞的《宋代救荒史稿》(天津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也有相关内容涉及宋代仓

结语

两宋时期是古代仓储机构建设非常突出的阶段。本文择取其中最为重要的三类——义仓、常平仓、社仓,将三者做一综合比较。总体来说,官方力量在宋代仓储建置中占有主导地位,所以在社会救荒的过程中起着首要的作用;宋代常平仓与义仓作为官方主导下辅助救荒的机构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两宋时期,官方也积极整合民间力量参与社会救荒,宋廷在立国三年之后即兴置义仓最具象征性的意义。只是在两宋时期相当长的时间内,民间力量虽参与救荒当中,在很大程度上却受到官方之监管,缺少主体性。直到南宋孝宗时期社仓的推广成为事实之后,民间力量在社会救荒中的作用才更为突出,主体性显著增强。南宋推广社仓的一个重要背景是常平仓、义仓的运行已不能满足社会救济的正常需求,存此背景,由社仓的推广,我们可以看到宋代社会救荒力量由官方向民间的转向。但最后必须指出,虽然宋代社会救荒从整体上讲是以官方力量为主体,但对民间力量的整合与依赖却一直存在,且程度不但加深,其表现不止于一端。本文只是以宋代仓储机构为例的综合分析,更为全面的讨论,还有待将来。

储,但并未有仓储之综合比较研究。

- ② 关于下达此条诏令的时间,见存文献主要有两种说法,一为建隆四年三月,上引《宋会要辑稿》即是;一为乾德元年三月,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两种说法不同,系由一年两元所致,事实上其所指时间完全一致;而因当年十一月才改年号为乾德,故此据《宋会要辑稿》。
- ③ 事在乾德四年,彼时诏令有言:“朝廷比置义仓,以恤百姓,盖防歉岁,用赈饥民。访闻重迭供输,复成劳扰,俾从停废,以便物情。其郡国义仓并罢之。”(《宋会要辑稿》食货五三之一九,第7213页。)
- ④ 朱熹在《建宁府建县长滩社仓记》中言:“建阳之南……绍兴某年,岁适大侵……里中大怖。里之名士魏君元履为言于提举常平使者袁侯复一,得米若干斛以贷,于是物情大安,奸计自折。”(《朱子全书》之《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79第3777—3779页。)而李心传记:“布衣魏拱之谓民之易动,盖因艰食。及秋,乃请于本路提举常平公事袁侯复一,得米千六百斛以贷民。至冬而取,遂置(社)仓于长滩铺。”(《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61,绍兴二十年九月丙申条,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623页。)
- ⑤ 社仓在功能方面延续着义仓而来,但南宋社仓并未取代义仓。南宋社仓推广以后,义仓依然见存。蔡华在《北宋义仓制度述论》(《甘肃理论学刊》,1993年第5期)一文中,认为“南渡后,新兴的社仓取代了北宋义仓”,是不合史实的论断。
- ⑥ 张文曾将宋代仓储分为“全国性仓种”与“地方性仓种”两大类,

其中常平仓与义仓属于全国性仓储机构,社仓则属于地方性仓储机构。张氏分类的标准是中央与地方在组建仓储中的参与程度及仓储的隶属情况,无可否认,这种分类有一定的道理。但南宋朝廷也曾诏令社仓于全域推行,所以就其分布情况来看,宋代社仓其实也具有“全国性”。张文的分析,见《宋代社会救济研究》第二章第二节,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9—40页。

- ⑦ 该书往往被视为古代最早的荒政专著,书成于南宋宁宗时期。其《原序》称该书中、下两卷分别“条陈今日救荒之策”和“备述

本朝名臣贤士之所议论、施行,可鉴可戒可为矜式者”,可以说涉及宋人实际的救荒举措以及关于救荒的各种言说,大体能够反映出宋人救荒思想的主要内容。尤当注意的是,董氏在“救荒之策”中,将仓储机构列在首位。义仓、常平仓、社仓是为其中最为重要的主体,义仓则尤为突出;这反映出宋人关于实践救荒思想的主要思考,也足见义仓作为备先之具的重要意义。而这一点在下卷宋人的“议论、施行”中又每有体现。可见言说与现实在相当程度上是吻合的。

参考文献:

- [1] 徐松.宋会要辑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2014.
- [2] 周一良.隋唐时代之义仓[J].食货,1935(2;6);潘孝伟.唐代义仓研究[J].中国农史,1984(4).
- [3] 何适.宋代义仓研究[D].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3.
- [4]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0.
- [5] 孔祥军.两宋常平仓研究[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4).
- [6] 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点,1975.
- [7] 梁庚尧.宋代社会经济史论集[D].台湾: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
- [8] 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 [9] 朱熹.朱子全书·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 [10] 王懋竑.朱熹年谱[M].北京:中华书局,1998.
- [11] 董煊.救荒活民书[A].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12] 邓拓.中国救荒史[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 [13] 魏丕信.18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
- [14] 郭九灵.宋代义仓论略[J].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2008(3).
- [15] 许秀文,阎荣素.论宋代义仓[J].河北学刊,2006(5).
- [16] 张敏.宋代常平仓研究[D].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2.

Barns and the social reliefs in Song dynasty

HE Shi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Communication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Abstract: In Song dynasty, three kinds of barns are the institutions to store grains, which are both different and similar. The charity barns mirror the governmental concerns for the grassroots, and governmental barns reflect the official force, while the community barns speak for the folk force in social reliefs. The intermingled governmental with non-governmental forces mark the increasing trend of the folk force in the social relief.

Key words: Song dynasty; barn; social relief; official; non-government

[责任编辑 程 慧]